

亚洲探险之旅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路探险记

〔日〕

大谷光瑞 等著
章莹 译



亚洲探险之旅

● [日] 大谷光瑞 等著 章莹 译

丝路探险记

●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路探险记

(日)大谷光瑞等著 章莹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80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228—04842—3/K·629 定价:15.80元

公元 1486 年，一个名叫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葡萄牙人乘船第一次航行到今天的非洲南端。他把他登上陆地的地方叫做“暴风角”。回去后，他向国王汇报，国王说：“不，你发现的不是‘暴风角’，而是‘好望角’”。1492 年 10 月，一位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想从地球上找到富饶的中国、印度，但他的航船却意外地撞到了今天的美洲大陆。1519 年，费尔南多·麦哲伦从今天的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探寻到一条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交通线路。于是，这些人便被认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探险家。历史学家把哥伦布看作是“新大陆的发现者”，把麦哲伦称作“最伟大的航海家”。虽然，麦哲伦最终以他的暴行被菲律宾人杀死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发展、提高，重要原因是人类总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各项探索。狄亚斯、哥伦布、麦哲伦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探索。这种行为就是走前人从未走

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寻求目标。因为这种行为总伴随着自然或人为的危险，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称之为“探险家”。

纵览人类的探险史，我们会从中发现探险家的目的、动机甚至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探险家各自的目的和政治动机，单纯从他们的成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而言，我们就会相信，探险对人类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哥伦布、麦哲伦这些人的探险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各大洲之间交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互相认识和了解。

世界认识亚洲、亚洲认识世界，同样首先是通过一批有勇敢精神的人们的探险活动而实现的。特别是世界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所历途径，都是一样。第一个来中国，并且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时是中国的元朝。而在这之前，中国晋朝的大僧人法显已经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走到了印度各地及今天的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从海洋上漂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他的动机是取经和参佛，但他身上所具备的却是探险精神。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的、至现在还被世界津津乐道的大僧人、大法师玄奘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所谓的“死亡之海”、“高原禁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千难万险地从长安走到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历经13年，然后又回到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中国长安。中国的旅行家、探险家的著作，给中国提供了认识外界的知

识，甚至还给印度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连他们本国也没有记载下来的实录。请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岂不是十分明白吗。

人类依靠自然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繁衍。一个群体，最初形成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他们被海洋或者高山、大川隔绝，外界想触探他们那儿，就要探险；同样，他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要探险。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在法国举行的'98 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法国人共同欣赏足球明星漂亮的射门。但在人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年代，不通过探险是绝对了解不到另一个天地的真正面目的。大至一洲与另一洲，小至一国家与另一国家；此一地到彼一地，此一族到彼一族，应该说都是这样。探险家的实地访问记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场直播”！到亚洲大陆各地进行过探险，并且写下探险记录的那些人的著作，也是被考察地区地理和人文景观的“现场直播”。

19 世纪的下半叶和 20 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 20 世纪的头 10 年和 20 年里，是亚洲探险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探险者之中，论洲别有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论国别则有英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以及日本人等；论探险者们所从事的专业，则有考古学家、登山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学家以及记者、旅游者等等。他们的足迹所至，东起库页岛，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地，南至缅甸、印

度北部。我国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云贵高原无不成为我们探险的目标。这些地方的名山大川、荒漠戈壁、少数民族聚居区、古代城镇遗址无不印下那些外国人的脚印。其中，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古代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地更是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热点。通过这些人的探险和发掘，一批高山被征服了；一些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被他们越过了；哈拉浩特、高昌、交河、楼兰、尼雅等一批古代城镇或烽燧遗址被他们挖了又挖，掘了又掘；敦煌莫高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佛教艺术洞窟被他们考察了个遍。成千上万的文物被发现或挖掘出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人物；有的人被本国、第二国甚至第三国聘为院士之类的专业职务，甚至为他铸造了纯金像。主要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此人探了“险”，得到了他们国家官方或私人无法得到的知识。

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亚洲当然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亚洲的社会进步是亚洲应当做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只能由中国人推动。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或北洋军阀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今天的亚洲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国的各个边疆地区也是从那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亚洲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是什么样子？这就不能以今天的繁荣去推测了。比如拿丝绸之

路重要路段的塔里木盆地而言吧，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四周城镇林立，绿洲连片，高等级的公路，方便的食宿。那么，当年呢？当年是否也是这样的繁荣和发达呢？对此，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那么，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办法只有一个，去阅读研究专著和探险家的见闻吧。而学术专著并非普通人能读到或读得懂，而探险著作就不同了，它大都是见闻、历程的直接记录，好读，有趣，易懂。对于学术界人士不可或缺，对于普通求知者也不是天书。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亚洲探险的探险家们，大多数人都大块大块的文章，一大部一大部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物。从回首过去、增长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著作都是难得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者为数极少。我们所见者仅系凤毛麟角。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昨天亚洲各地区，特别是让读者能够广泛地知道昨天的我国各个角落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景观，我们决定组织一定人力，投入一定财力，把一些比较好的亚洲探险著作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亚洲探险的著作很多，语种各别，优劣不一。我们所选者皆是那些严肃认真的、知识性、科学性较高的。总之，我们并不是白菜、萝卜一把抓，而是尽量选择其中的最精彩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探险者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无关宏旨。我们现在不也是经常要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的，那么，

我们听一听昨天的外国人对昨天的我们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样看待问题，我们的读者和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共识的。

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走向活动区域之外的世界之路,也是世界通往中国的中原之路。提起丝路探险,人们对斯文赫定、斯坦因等欧洲探险家比较熟悉,而对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却知之有限,就连当时的日本人自己也不太了解。

大谷光瑞(1876~1948)是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净土真宗的精神领袖,西本愿寺的第二代法主,号镜如门主,一生主要从事佛教政治活动。1900年大谷光瑞在伦敦留居期间,身为天皇内弟的他经常造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从该会得到了一些在中国新疆和阗、库车等地发现古代遗迹及佛教文书的消息,这就加深了他对西域的兴趣。西域,这块昔日商旅不绝于途,而当时又是人所罕至的大地,充满了疑云与诱惑。它磁铁般地吸引着大谷光瑞。1902年,即将回国的他组织了一个探险队,从伦敦开始了梦寐以求的亚洲腹地探险。同年8月,他与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一行五人踏上了第一次探险的旅程。本书中的《帕米尔纪行》、《在中亚古道上》

和《塔里木之行》都详细地记述了这次探险的情况。

1905年日俄战争刚结束，大谷光瑞就着手组织第二次探险。此次探险队新增加了两名年轻人，他们是野村荣三郎和橘瑞超，而橘瑞超是个只有18岁的和尚。本书的《蒙古、新疆之行》和《新疆探险记》便是大谷探险队第二次活动的记录。这次中国之行成为橘瑞超第二次中国西部探险的契机。他不仅表现了对艰苦环境的耐力与承受力，也为以后的探险积累了经验。

1909年，结束了第一次探险的橘瑞超，在印度与巡游中的大谷光瑞夫妇一同从埃及漫游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听说野村荣三郎再入中亚的计划受阻，便向大谷光瑞提出要再入中亚的请求，这就是大谷探险队的第三次探险活动。为使这次探险顺利进行，橘瑞超不仅在物质上做了充分准备，而且还拜见了住在伦敦的斯坦因，又去斯德哥尔摩造访了斯文赫定，听取了他们的建议。1910年8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成行了。

从1910~1914年的第三次探险活动，先是橘瑞超，尔后是吉川小一郎两人进行的。吉川原本是大谷光瑞派到中国寻找橘瑞超的。在敦煌等候橘瑞超的四个月中，吉川就在当地积极发掘佛教遗迹，橘瑞超回国后，他留在吐鲁番继续考察和发掘。气候炎热，发掘困难时，吉川便翻越天山，进入古城子，在吉木萨尔附近和博格达山中，度过近五十天后，经乌鲁木齐再回到吐鲁番。接着他还到过喀什、和田、阿克苏、伊宁。吉川小一郎没有热衷于那些人迹罕至的路线，而是选择别人已经旅行过，但没有

仔细考察过的地区。所到之处都进行了细致的发掘调查,而且收获颇丰。回国时,他搜集的文物包装成八十六件行李,运到日本。在大谷探险队带到日本的文物中,吉川的收集品最多。本书《中亚探险》、《敦煌见闻》和《天山纪行》记录了这三次探险活动的经过。

对佛学的探求表现异同寻常的痴情,是这些日本和尚成为探险家的重要品质之一,也是促使他们能够克服千难万险,前往中亚穷乡僻壤,到荒无人迹的沙漠荒原从事考古发掘的精神支柱。这些装备齐全的东瀛僧侣们,怀揣充裕的资财,每到一处都要拜访当地官员,这为他们在西域的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或许他们汲取了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因无视当地居民而遭灭顶之灾的教训,他们与当地居民都能很好地相处,这也是他们在西域得以顺利考察的重要条件。

从1902~1914年,大谷探险队的三次探险活动详细考察了佛教东渐的路线,寻访了古代中国取经僧赴印度取经留下的遗迹,并考察了伊斯兰教传来之后佛教残存的状况,这些都有助于佛教史上一些疑难问题的研究。三次探险搜集的文物包括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书、绘画、雕塑、刺绣、古钱币等。这些对于认识新疆和田、库车、吐鲁番等地区的历史作用很大。

大谷探险在日本探险史上可谓规模空前绝后。但第一次探险的成绩却被日俄战争的风云所淹没。当时的日本报纸,只部分地连载了探险经过,出了一部分单行本。全面、详细介绍这支探险队的惟有1937年日本有光社出

版的《新西域记》，首次将大谷探险队所得到的资料和文物公诸于世。但这部上、下两卷的庞然大物，因为是限数出版，价格昂贵，所以，外界对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了解得并不多。加之内容繁杂，一般人不易卒读。在中国，知道这部书的人屈指可数，因此，普通中国人对大谷探险队的活动及其成果了解得更少。现在我们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选出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部分，将其译成通俗易懂的读本，奉献给广大中国读者，让中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大谷探险队的全貌，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初衷。

这些书稿是七八十年前的作品，作为当时的日本探险者，当然具有与现代人所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观，也由于作者的局限性，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为尊重原作故保留了原貌。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这些探险著作，是因为这些著作是一批精神财富，对于研究亚洲各地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加深我们对亚洲大陆深层次的了解有启迪和借鉴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与我们的不同认识也就显得次要了。对于这一点，我想广大的读者也是容易理解的。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格外引起世界注意的时代。因为,在 19 世纪后半叶,地球上几个未探查地区(例如北极、南极等)都被世界各国有名的探险家征服了,而在亚洲的腹地、塔里木盆地、西藏高原、克孜勒库姆沙漠等地区,还有许多地方尚未得到探查。因此,像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的斯文赫定等著名的探险家们接连不断地访问了这些地区。

新疆的塔里木地区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干燥地带,并且自古以来是有名的丝绸之路通过地区,很多古代的遗迹已经被发现,的确是考古学的资料宝库。自 1890 年巴瓦文书被发现以来,该地区发现的文书、遗物,简直无一不令当时的史学界震惊。

1899 年,在罗马召开的第 12 届国际东方学会上,拉德洛夫等学者关于这些古文书研究的成果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接着,1902 年在汉堡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东方学会上,成立了“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研究国际学会”,旨在把中亚的探查、研究作为

一项国际性共同事业来进行。但由于当时与中亚有关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这个学会不久就名存实亡了。各国分别向中亚派出了探查队,比如英国的斯坦因(三次)、德国的勒柯克(四次)以及法国的伯希和等。

日本佛教名刹西本愿寺的主持、27岁的大谷光瑞,早就对这个地区深感兴趣。因为,西域曾是佛教东渐的重要地区,他早就想亲临实地调查,收集古代经典。当时世界各国的中亚探险无疑促成了他的决心。于是从1902年8月开始,三次向中亚地区派出了“大谷探险队”。

大谷探险队的足迹涉及今中亚地区,主要是中国的蒙古、新疆、云南、西藏,以及帕米尔、尼泊尔、印度等地,可以说中央亚细亚的主要地方大体都已走遍。与各国探险队相比,大谷探险队的踏查范围是最大的。在日本来说,其考察规模也是空前的。

大谷光瑞不仅仅是探险队的策划者,还亲自参加了探险。第一次探险队于1902年8月从伦敦出发。他和四名随从一起,经俄罗斯到达里海岸边的巴库,随后经撒马尔罕、浩罕,到了奥什,翻越阿赖山脉,到达喀什。

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后,大谷探险队分为两支小分队。第一队,由大谷光瑞率本多惠隆和进上弘圆翻过西喀喇昆仑的明铁盖达坂,到达今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然后到达印度的斯利那加。关于这一阶段的旅行记就是本书中的《帕米尔纪行》。文章详细地记述了道路险峻的状况。大谷光瑞回到日本,由大谷派本愿寺出版了非卖品《印度摄影集》。

第二队，即渡边哲信、堀贤雄两人，在塔什库尔干与大谷光瑞一行分手后，沿古丝路南道进入和田，然后沿着和田河北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阿克苏。他们明知八年前斯文赫定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时差点送命，但仍下定决心从和田出发了。他们雇了曾经给斯文赫定当过向导的卡西木，用了22天，纵向穿过沙漠，到达阿克苏。

从那时开始，他们用了四个月时间，调查了天山南路各处的佛教遗迹。这一带曾经是佛教非常繁荣的地区。伊斯兰教进入之后，佛教才衰落下来，留下了不少遗迹。大谷探险队重点进行发掘和调查这些遗迹，所以这两名僧人对这项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其中对库车周围、克孜尔千佛洞的发掘收获很大。但堀贤雄所画的实测图后来不幸遗失。

他俩随后到乌鲁木齐，逗留了约一个月后踏上归途。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探险活动到此结束。这次旅行长达三个月。本书中堀贤雄的《在中亚古道上》就是那一段的纪行，而渡边哲信《克孜尔踏查记》中与堀贤雄纪行中重复的部分，采用了调查库车周边遗迹的部分。

大谷探险队的第二次探险，始于1908年6月。野村荣三郎和当时年仅18岁的橘瑞超，从北京出发，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大旅行。他俩经张家口，穿过外蒙古的茫茫戈壁沙漠，到达今乌兰巴托。然后继续向西，横穿外蒙古，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进入准噶尔盆地，10月26日到达乌鲁木齐。

离开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调查了吐鲁番周围的遗迹。次年二月，两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进入南边的罗布沙漠，野村沿北道朝库车方向前进。这一阶段橘瑞超的探险日记后来被火烧毁，所以缺乏详细记录，只知道探查了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王国（在那里他发现了有名的李柏文书）。又从南道的若羌朝西，经和田、莎车到喀什。野村对库车周围进行了发掘调查之后，经阿克苏到喀什，等候失去联络的橘瑞超。约过了五个月，两个人终于见面。从喀什到印度的斯利那加有两条路。一条是前述大谷光瑞走过的，要翻越明铁盖山口，另一条要翻越喀喇昆仑山口（5670米）。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选择了后者。越过喀喇昆仑山口，又越过萨塞尔山口，进入印度河边的列城。

第二次大谷探险队的最大成果是从外蒙古到准噶尔盆地的旅行。本书中野村荣三郎的《蒙古、新疆之行》，重点引录了这一部分。

结束了这次探险的橘瑞超，于1909年末，在印度与巡游中的大谷光瑞夫妇会合，随后陪同大谷夫妇到伦敦。野村荣三郎原打算再次进入中亚，但没得到英国和印度政府的允许只好回国。橘瑞超在伦敦听说此事后，要求亲自去西域。这就是后来的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探险。

橘瑞超在伦敦会见了斯坦因，又去斯德哥尔摩会见了斯文赫定，听取了他们的建议。随后于1910年8月，开始了对他个人来说是第二次的中亚探险。陪同他的助手是一个年仅18岁、名叫霍布斯的英国少年。他们首先经过俄罗斯到达乌鲁木齐，发掘了吐鲁番周围的遗迹。然